

第五屆「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鄭成功、劉銘傳】
2003年4月25～26日

台灣史觀的建立及其擴張

從現階段中國的台灣文學史書寫策略談起

陳芳明

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當史料不斷挖掘出土

所有從事台灣研究者越來越注意到一個事實，便是許多長期受到遺忘、塵封、禁錮的史料，由於思想的開放而次第重見天日。台灣社會日益邁向沒有禁忌的年代之際，歷史留下來的疑惑與謎團也因史料的不斷出土而逐漸獲得解答。無論是歷史研究或文學研究，都正面臨一個再整頓、再解釋的階段。

史料出土運動之蔚為風氣，誠然是從民間橫跨到官方的一種歷史意識的覺醒。自八〇年代晚期以降，由於二二八事件的平反運動而捲起了史料挖掘的風潮。除了口述歷史的採訪在民間展開之外，官方也在客觀形勢的要求下次第公布檔案文件。口述歷史的大量挖崛，已不再只是侷限於二二八事件。凡是戰後發生的重要政治案件，包括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的歷史採訪，也都陸續整理出版。這種工作的範圍，也逐漸從戰後歷史往上追溯到日據時期。中研院採訪日據時期知識份子的中國經驗，以及民間也對日據的藝妓、媳婦、慰安婦等等史料的查訪，都顯示歷史記憶的重建，已是現階段台灣研究的主要動力。這種史料上不懈的追索，無形中擴大了歷史視野。

官方史料開放的範圍，也逐漸偏離二二八事件而擴及其他層面，台灣

省文獻會的台灣拓殖會社史料有計畫地製成數位光碟，國史館也逐漸從黨史的整理，而漸漸注意到戰後民主運動史料的收集。尤其是雷震冤案的內部文件之公布，為台灣社會帶來一定程度的衝擊。台灣各縣市的文化局在史料整理上，也不遺餘力。像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初步翻譯完成的《熱蘭遮城日記》，為荷鄭時期的研究帶來全新的觀點。

無論是口述歷史或官方檔案的問世，在一定程度上，已為台灣史學的建構注入了巨大的改造力量。以二二八事件的口述歷史為例，其中所開發出來的歷史記憶，已不止於受難者的生命經驗。對於戰後初期的研究者，可以從這批口述歷史窺探當時的社會變遷、文化現象、經濟發展與政治形勢。同樣的，官方檔案的公布，也不能窄化其史料性質。從記錄的內容，可以了解人口結構與權力結構，也可以從統計數字推知經濟景氣。幾乎可以說，當史料紛紛撥雲見日之際，台灣史研究者已不可能只是停留在傳統文獻學或考據學的窠臼，而開始被要求去投入歷史解釋的突破。

史料的出土亦不僅限於歷史研究而已，在文學研究方面也漸漸受到更多更大的挑戰。我自一九九九年夏天著手撰寫《台灣新文學史》以來，越來越能感受史料出土的壓力。在撰寫之初，可以利用的文學史資料就已非常繁複龐雜。然而，經過三年的書寫過程中，許多重要作家全集的編輯，以及重要文學史料的整理，都先後完成。例如我在寫賴和時，從未看過他的手稿，林瑞明教授編的《賴和全集》手稿本卻在二〇〇〇年出版。當我完成新舊文學論戰的一章時，輔大中文系博士翁聖峰整理的文學論戰史料仍未問世。同樣的，《楊逵全集》、《張文環全集》、《王昶雄全集》等重要史料，都在最近兩年正式出版。這些新史料的公布，足以填補我的文學史書寫之闕漏。不僅如此，對於作家的評價與文學的流變，都必須重新解釋。

《台灣新文學史》計畫的實踐經驗，使我深深體會到，台灣研究這個領域永遠是處於生動的狀態。這項歷史書寫的工程，至今已耗去我四年的時光。然而，面對龐大的歷史遺產，以及不斷重見天日的史料大量湧現，我必須承認，如果不能選擇一個清楚的歷史位置，就無法理清台灣歷史多元、多軸發展的特性。

正因為有這樣深刻的體驗，我也注意一個不能忽視的事實。那就是來自中國的歷史解釋，展開毫不懈怠的干擾與干涉。對於複雜多變的台灣歷史與台灣文學，中國學者企圖把這門學問簡化為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

史。這個簡化的策略，背後當然有強烈的政治意味。檢驗中國學者對台灣的歷史解釋，自然可以理解到，台灣史觀的建立對於現階段我們的歷史研究具有何等深刻的意義。

為什麼中國要展開台灣研究

中國之發現台灣歷史與台灣文學，是相當遲晚的事。至少在一九八〇年之前，未聞中國境內有任何機構或任何學者注意到台灣文學的存在。如果北京對台政策的方向沒有調整，台灣文學在中國的學術版圖上絕對不會有任何的能見度。今日台灣文學研究在中國之所以能夠蔚為風氣，並非是由學者自發自主地去發展、渲染、擴充，而是由於北京官方的指令所致。觀察中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就可發現他們的研究立場全然是為了配合北京對台政策的轉變。

自一九八〇年以降，參與台灣文學研究的工作者，在北京高舉「一個中國，和平統一」的旗幟下開始收集台灣文學的史料，並且也進行分析與詮釋。他們的書寫策略與思維模式，全然沒有偏離北京決策者所規範的方向。因此，中國的台灣文學研究，在現階段的所具備的政治意義可謂高於學術意義。誠如參與研究的工作者劉登翰所說，中國出版的台灣小說選、散文選、詩選，以及相關的《台灣香港文學論文選》，「都把對於台灣文學的介紹與研究」納入政治的範疇，要求為它『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發揮應有的作用』。（劉登翰，〈台灣文學研究十年〉，收入福建省台灣研究會等編，《台灣文學的走向》，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0。）

這種說法，無疑是公開承認台灣文學研究之濫觴乃是隨著政治氣候的轉變而發生的。必須等到北京對台政策進行重大調整之後，台灣文學的存在才被發現了。

近二十年來，台灣文學研究在中國的崛起，可以說是一段從「發現台灣」到「發明台灣」的過程。因為，台灣文學在台灣的發展，並不需要受到中國學界的發現才能證明它的存在。問題在於，中國發現了台灣文學之後，究竟是以怎樣的治學態度來看待？最初台灣文學被發現時，中國學界仍然停留在探索陌生領域的狀態。他們積極轉載台灣作家的作品，出版台灣文學的選集，並未實際做深入的分析研究。從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二年，中國發行的文學刊物如《當代》、《收穫》、《上海文學》、《安徽文學》、

《十月》、《清明》等等，都零星看見台灣作家的小說，特別是台灣的海外作家的作品，次第受到介紹。

隨著北京對台政策之轉為積極，台灣文學研究也漸漸邁入學術研究的領域。自一九八二年之後，以「台灣香港文學學術討論會」為名義的學術活動成為定期舉行的儀式。到了九〇年代以後，這樣的活動又擴大成為「台灣香港澳門暨海外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從這種調整，也可反映台灣文學研究全然是配合北京對外政治活動層次的提昇。然而，也正是有這樣的轉變，台灣文學研究也開始有了「發明」的傾向。當這方面的學術研究必須依照政策的規定去進行時，許多文學史上的議題都無可避免會受到變造與創造。

對於台灣文學的變造與改造，在一九八六年以後節奏就更為加快。這是因為中國學界開始進入台灣文學史書寫的階段，也是官方正式收編台灣文學的最新發展。如何把台灣文學史套入中國文學史的脈絡裏，是現階段中國學界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到目前為止，台灣文學的研究成果也透露了中國的書寫策略。這篇論文，主要在於考察這些書寫策略的主要特色。

「東方化」台灣：以想像取代現實

台灣是中國的「東方想像」。在此，「東方」具有兩個意義。第一是地理學上的意義。台灣是中國東方海上的一個島嶼。自有歷史記載以來，台灣在中國文獻上都是神祕的、定義不明的名詞。從晚明陳第的《東番記》，到清初郁永河的《裨海紀遊》，都強烈顯現中國官員對這個島嶼充滿了憧憬與幻滅。無論是「蓬萊仙島」式的欲望投射，或是「瘴癘之地」式的貶抑之詞，都可照映出近代以前中國對台灣的奇異幻想。第二、由於有高度的想像，「東方」遂產生了富於政治暗示的文化意涵。到清末割讓台灣為止，在帝國繪製各種版本的地圖上，從未描摹一幅完整的台灣圖像。然而，台灣圖像在中國史籍中是何等殘缺，傳統書生與現代學者都依照自己的想像，來形塑並解釋台灣文化的內容。這種建構台灣想像的方式，便是屬於「東方化」台灣（Orientalizing Taiwan）的一種策略。一如薩依德（Edward W. Said）在其《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所說，西方白人還未到達並理解東方之前，就已事先建構一個東方圖像。他們以這樣的圖像來取代真正的東方，而這就是薩依德所說的「東方化東方」（Orientalizing the

Orient）。

同樣的道理，中國學界在發現台灣文學之後，也是依照「統一大業」的想像來取代台灣文學的真正內容。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書寫方式，是一種「東方化東方」的策略，也是對台灣文學進行「東方化台灣」的具體實踐。把台灣文學整編到中國文學史的脈絡裡，牽涉到歷史解釋的立場，亦即所謂史觀的建立。史觀問題必然會觸及中國社會與台灣社會在近代發展的內容及其性質。但是，在進行台灣文學研究之前，中國學界已事先預設一個立場，全然無視台灣文學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所產生的差異性。這種毫無差別的解釋立場，構成中國境內「台灣學」的主要基礎。「台灣學」的性格，與西方學界營造出來的「東方學」（*Oriental Studies*），在思考模式上幾乎是相互呼應的。

中國的「東方學者」（*Orientalists*），基本上並沒有實際的台灣歷史經驗，甚至也不具備台灣經驗的任何經濟基礎。他們欠缺嚴謹的理論訓練，也欠缺審慎的文本分析能力，更欠缺獨立自主的發言位置。事實上，他們並不需要任何具體而實際的歷史經驗。在中國學術風氣開始進入重大轉型之際，他們固守著北京的對台政策，自甘接受官方的政策指令。他們的歷史詮釋與文學詮釋，從未踰越北京官方所規範的上限，這正是他們「東方化」台灣的最高原則。他們較為重要的工作，便是如何取得台灣文學的作品與史料，然後進口集中於幾個學術機構從事加工與創造。這些透過迂迴、輾轉取得的作品與史料，就成為他們書寫台灣文學史的重要根據。自一九九〇年以後，中國的台灣文學史書寫，仍然停留在靜態的階段。他們窺探台灣，凝視台灣，想像台灣，卻並不理解台灣。他們的文學史書寫，全然在於滋養北京對台政策的思考。

最早具有企圖心要建構文學史的，反映在封祖盛所寫的《台灣小說主要流派初探》（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該書〈前言〉清楚表達了作者的「東方想像」：

台灣省的文學，一直作為中國文學的一個分支而存在，發展。在歷史上，台灣省曾先後被荷蘭、日本的殖民主義者占領，成為他們的殖民地，幾達一個世紀。中國新民族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新中國成立後，國民黨當局又把台灣省置於自己控制之下，使它和祖國大陸隔絕。因此，台灣文學的某些方面不同於中國大陸各省文學的特點，就更加鮮

明、突出了。儘管如此，它著重反映的始終是中國的人生，滋潤它成長的始終主要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因而它也就始終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與整個中國文學血肉相連，而非像某些研究者說的那樣，是什麼介乎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之間的「孤兒文學」。

對於「台灣文學的某些方面不同於中國大陸各省文學的特點，就更加鮮明，突出」的論點，封祖盛並未做任何深刻的分析。他立即獲得圓滿的結論：「儘管如此，它著重反映的始終是中國的人生。」台灣文學竟至於如此空泛而貧乏。殖民地社會中的矛盾與掙扎，台灣社會受到的資本主義改造與現代化洗禮的過程，都不在封祖盛的思考之內。先有前提與結論，然後再去尋找證據來支撐書寫的立場，正是東方想像的重要特色。

由劉登翰、莊明萱、黃重添、林承璜主編撰寫的《台灣文學史》（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可能是部頭最大的著作。在展開歷史書寫之前，他們已集體預設一個立場。整個台灣文學史的發展，便順理成章依照他們的主觀意識鋪設了既定的軌跡。在該書〈總論〉，鮮明地呈現了他們的台灣想像：

毫無疑問，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一為海峽兩岸所共識的命題，包含著兩層意思：一、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分支，它們都共同淵源於中華民族的文化母體；二、台灣文學在其特殊歷史環境的發展中，有著自己某些特殊的形態和過程，以它衍自母體又異於母體的某些特點，匯入中國文學的長河大川，豐厚了中華民族的文學創造。

為了使這種想像變成真實，他們不憚其煩地從事歷史考證，溯自三國時代的「夷州」，宋代以後的「澎湖」，以至鄭成功時代的「台灣」等等。歷史上的夷州、琉球之說，至今仍然紛紜未定。但是，在台灣文學史的書寫過程中，這些歷史想像就成為重要的依據。只有通過這樣的推理，才能使其預設的立場合理化並合法化。

「同質化」台灣：排斥文學的差異性

台灣文學研究乃是中國「東方學」的重要一支。為了把台灣文學史納

入中國文學傳統的脈絡之中，中國的東方學者用心良苦把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等同起來。這是文學史書寫的一個重要策略，亦即把具體的歷史經驗抽離出來之後，台灣社會的內容與性質便全然毫無二致。換言之，他們刻意把中國視為文化主體，而台灣是構成這個主體的一個部份。由於歷史經驗的抽離，中國與台灣之間遂並不存在任何的差異性。

以莊明萱、黃重添等著的《台灣新文學概觀》（廈門：鷺江出版社，1991）為例，在解釋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時，就直接表明：「從政治背景看，1840年爆發鴉片戰爭以後，台灣同胞與祖國大陸人民一樣，經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這種敘述方式，全然視台灣社會的殖民經驗為無物。緊接著這段陳述之後，歷史立即跳接1919年的五四運動，台灣青年立即響應中國的「反帝反封建」運動。沿著這樣的思考模式，便獲得如下的結論，台灣新文學「是中國新文學的一個支流，具有愛國的反帝反封建性質。即使1949年以後，它所表現的現實意識，仍是以往的回響與延續。」

要「東方化」台灣，便是優先依照中國歷史的模式為台灣文學量身訂製，也就是把台灣文學「同質化」（homogeneonized）於中國文學，或者如劉登翰等著的《台灣新文學史》（上卷）指出，台灣人民「總是把祖國的命運當做自己的命運，把祖國人民鬥爭的目標當做自己的鬥爭目標，把祖國人民鬥爭的經驗，當做自己鬥爭的前導。」

毫不區別地看待中國歷史與台灣歷史，正是把台灣文化主體抽樑換柱的最好策略。為了進一步同質化雙方的關係，中國的東方學者還從美學層次去分析。林承璜的《台灣香港文學評論集》（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4）有極其奇異的見解：「海峽兩岸文學的主潮都是現實主義民族文學，現實主義是中國文學的傳統，它深深地影響著在大陸的文學和在台灣的文學，所以它們30多年雖然被切斷了關係，但各自恪守和遵循著中國悠久的文學傳統——現實主義的軌道行進。」

或者，就像另一位文學史書寫者古繼堂的《靜聽那心底的旋律——台灣文學論》（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1989）也有同樣的見解：「台灣新詩的孕育，誕生，成長和發展，和大陸新詩有著非常相似的經歷。台灣新詩是在『五四』運動直接影響和孕育下誕生的，是台灣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佔領和奴役為中心內容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的一部份。這種在兩個文化之間劃上等號的思考方式，一直都是這些東方學者遵守的共同原則。」

對他們而言，中國遭逢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經驗，以及台灣承受的殖民主義（colonialism）經驗，完全是沒有兩樣的。從具體的歷史事實來看，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有其本質上的差異。

中國近代史，無非是一部充滿血淚的帝國主義侵略史。猶似台灣近百年來的歷史，乃是一部受損害、受侮辱的殖民統治史。不過，中國的文化策略似乎有意在帝國主義（imperialism）與殖民主義（colonialism）之間劃上等號。這種混淆的歷史解釋，達到了創造性模糊的效果，然而卻禁不起檢驗。帝國主義，以嚴格定義說，乃是強權使用軍事侵略方式，迫使弱國必須接受不平等條約，必須開放門戶接受資本主義式的剝削與掠奪。在政治上、經濟上，弱國無法維護獨立自主的身分。然而，在文化上，弱國就不必然完全喪失其主體性。相形之下，殖民主義帶來的傷害較諸帝國主義還嚴重，因為，強權者不僅在借來的空間進行直接的政治、經濟支配，並且在文化上展開抽樑換柱的工作，終至使殖民地人民喪失其固有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傳統。

比較帝國主義下的中國與殖民主義下的台灣，就可發現雙方在政經結構與文化性格方面已產生極大的歧異。中國受到資本主義的侵蝕，大部分集中於沿海地區的城市，但是整個廣大的農村腹地並未受到多少動搖。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可能培育了不少代理人，卻未直接在中國本部建立永久文化的政權。中國知識份子強烈感受到國家的危機，不過，他們的思維方式與語言使用卻絲毫不必受到帝國主義的影響。殖民地台灣的政經發展則全然不同，而文化主體的喪失更是較諸中國還更不堪設想。台灣總督府的設立，周密而徹底掌控了殖民地人民生活的全部內容。台灣島上幅員極小，並不存在類似中國的農村腹地，因此就完全不能避免資本主義的深刻滲透。自三〇年代以後，日語思考逐漸成為台灣知識份子的書寫依據。包括最具左翼批判精神的作家楊逵、王白淵、張文環、吳坤煌、蘇維熊、呂赫若、吳新榮、郭水潭等人，都已承認不使用日語便不足以表達他們的文學思考。右翼現代主義作家如巫永福、翁鬧，以及風車詩社的楊熾昌、林修二、李張瑞等，又何嘗不是需要訴諸日文才能進行文學創作。相形之下，中國三〇年代作家並沒有被迫使用帝國主義者的語言來從事文學想像的工作。殖民主義對於文化主體所構成的傷害，由此可以證明較諸帝國主義還來得深化深刻。

迂迴討論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之間的分野，主要在於指出強勢的中國

論述長期蒙蔽並阻撓台灣的後殖民視野。中國透過國際上有利而有力的發言位置，使許多後殖民研究者，無法分辨台灣歷史經驗與中國歷史經驗有何不同。從後殖民的觀點來看，台灣文學絕對是屬於第三世界的文學。台灣作家在語言思考與國族認同上的混亂，乃是不折不扣第三世界文學的主要特色。中國社會並沒有這種現象，即使以最寬鬆的定義來看，中國文學並不能劃入第三世界的範疇。飽受帝國主義侵略的中國，未曾喪失過歷史記憶與歷史發言權。中國文學的傳統，也從未因帝國主義的干涉，而發生過斷裂。甚至在國族認同與文化認同方面，中國知識份子也不曾受到嚴厲的政治挑戰。當其文化主體仍然保持得極為完整時，中國自然就不符合第三世界文化的規格。

然而，自一九七〇年以降，中國自封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在聯合國，在任何國際場合，北京自命為亞非拉的人民仗義執言。恰恰就是佔據了這種發言的位置，遂使許多國際學者誤認中國的歷史經驗乃是第三世界文化的重要一環。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便是持這種看法的代表之一。中國利用這種政治上的優勢，遂企圖以強勢的中國論述收編台灣的歷史經驗。這種政治基調，正是日後中國學者篡改、誤讀、曲解台灣文學史的最高指令。

「陰性化」台灣：抽離台灣作家的主體

在收編台灣文學的過程中，有一個重要的工作，便是如何把台灣作家轉化為具有中國意識、中國精神的作家。為了獲得完美的解釋，中國的東方學者特別強調台灣文學受到中國五四運動的影響。只要影響論能夠確立，台灣文學之匯入中國文學的歷史主流就得到合理化的解釋。這種詮釋的主要策略，便是認為台灣作家似乎沒有自己的主體。也就是說，台灣作家被陰性化（feminization）之後，就立刻成為靜態的、被動的作家，可供中國文學工作者肆意填補他們的想像。

以田銳生的《台港文學主流》（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一書為例，在第一章討論台灣文學發展歷程述略時，特別加重五四運動在台灣文學史上的份量：

當然，台灣新文學運動不是偶然的，它是在祖國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

而誕生的。1919年，偉大的「五四」運動爆發了。這一場轟轟烈烈、所向披靡的民主革命運動，以它徹底的、毫不妥協的戰鬥精神和嶄新的姿態震撼了世界的東方。它為正在尋求民族解放新出路的台灣同胞指明了方向，於是，台灣同胞毫不猶豫地跟定祖國母親的步伐，滿懷信心地開展了波瀾壯闊的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的影響，誠然對台灣新文學運動產生過衝擊，但不宜過份誇大。中國的東方學者，酷嗜強調留學北京的台灣作家張我軍的歷史影像。事實上，張我軍對台灣文學的重要性，乃在於他對台灣舊詩壇的抨擊。然而，在白話文的書寫方面，張我軍並沒顯著的貢獻。何況，自張我軍以降，台灣作家所寫的白話文，也都大量滲透台語與日語於其中。由於台灣是屬於殖民地社會，在日本強勢文化的教育體制之下，作家都不能不使用日語做為主要的表達工具。五四運動在台灣作家中並沒有成為思想啟蒙的關鍵。台灣最具批判性的左翼作家，完全都是以日文從事文學書寫，包括楊逵、王白淵、張文環、吳新榮、劉捷、吳坤煌、郭水潭、呂赫若等等。在他們的文學思考裡，五四運動並未有絲毫的影響作用。

陰性化台灣作家的顯著例子，可以藉助汪景壽的《台灣小說作家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來說明。該書討論日文作家楊逵時，對於這位左翼運動者的階級立場與國際主義色彩全然視而不見。甚至對於楊逵的日文書寫，也並未嚴肅看待。為了強調楊逵具有「中國傾向」，作者發揮了他豐富的想像力：「特別是像楊逵這樣的作家，處於日本侵略的高壓之下，被迫用日文寫作，然後轉譯為中文，文字粗疏在所難免。即使如此，他的小說創作仍然繼承著民族文學的優秀傳統，內容方面具有堅定的不屈不撓的民族意識，藝術方面則始終保持著鮮明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楊逵在從事日文創作時，從來沒有與中國「民族文學」或「中國作風」、「中國氣派」連繫起來。真正與楊逵過從甚密的，是日本左翼文學刊物《文學評論》的成員。楊逵的文學理論，也是受日本左翼文學理論家德永直的影響甚大。楊逵的小說，完全是在鼓吹當時盛行的「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口號，而這正是三〇年代國際共產運動在台灣社會的反映。依照汪景壽的解釋方式，楊逵似乎完全站在中國的立場。這種解釋，並不符合台灣的歷史事實，當然也不符合楊逵的精神面貌。

另外一位台灣文學研究者周青，在討論朱點人的作品時，也是刻意把這位日據作家的思想主體抽離出來，而注入研究者的主觀願望。朱點人在一九三五年發表小說〈秋信〉，乃是批判台灣總督府統治四十周年的慶祝活動。日本人在台北舉行盛大的台灣博覽會，一方面是為了向島民誇耀現代化的成果，一方面則是向國際宣揚殖民地統治的成功。小說中的主角斗文先生，在參觀博覽會之後，既憤懣於日本人虛偽的政治宣傳，也失落於台灣歷史記憶的沉淪，精神轉趨黯淡。小說中最大的批判，便是指向日本人在台灣展開的現代化運動。然而，無法抗拒歷史洪流的斗文先生，挫敗地面對整個台北都市面貌的劇烈轉變。他頹然坐在植物園，使手中的邀約信隨風飄落。周青在〈朱點人的幾篇小說初探〉一文中對這篇小說的解釋，竟然有出人意表的聯想：

最後，斗文先生氣憤憤地走出會場，就奔赴植物公園的撫台衙前憑弔一番往事，然後從身上摸出孫子同窗寄給他的那封信，他「眼前偏在箋末搜出四個印刷……蓬萊面影……來」。朱點人運用高超的象徵手法，讓印有「蓬萊面影」——即「台灣寶島」的信箋，「乘著風飄到地面的一葉梧桐的落葉上去」落葉歸根了。「蓬萊面影」的「落葉歸根」，暗示著被日本帝國主義占領的寶島台灣，終歸要回到祖國懷抱！這就是朱點人創作〈秋信〉的崇高意圖。（《台灣香港文學論文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一封印有「蓬萊面影」的信箋落在梧桐葉上，竟然引申為葉落歸根；而葉落歸根，又可連繫到「終歸要回到祖國懷抱」。這種想像，全然出自周青的主觀意志，並未照顧到朱點人的思考主體。小說中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以及日本殖民體制藉由現代化運動的擴張而建立起來的霸權論述，乃是朱點人積極抗拒的。在周青筆下，朱點人的批判精神又被另一套霸權論述扭曲變造了。

台灣作家被陰性化之後，自然就能夠成就中國文學的豐富。沒有台灣文學的陰性化，中國的偉大就不能夠膨脹起來。這種文學史的書寫策略，可以稱之為「採陰補陽」的史觀。以武治純研究吳濁流的文學為例，他在《壓不扁的玫瑰花》（北京：中國廣播電視，1985）典型地表現了這種史觀的演繹方式。他說，

總而言之，在現代台灣文學發展中的吳濁流精神，也就是台灣文學的主流精神，歷史已經在證明著，濁流先生的文學精神、文學活動，正如台灣最長的河流——濁水溪流注入寶島大地和台灣海峽一樣，已經匯入了台灣人民和全國人民文學事業的主流！

武治純對吳濁流作品的分析，較諸中國其他的研究者還深刻一些。但是，寫到最後的結論，卻突然顯露「採陰補陽」的身段，使他的整個治學態度全然傾斜。

近二十年來在中國的台灣文學研究中，常常會出現各種「發明」與「創見」。這種東方主義式的書寫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在建構霸權論述的苦心。從發現台灣到發明台灣的演變中，「東方化」、「同質化」、「陰性化」的種種策略，已經成為台灣文學史書寫的固定模式。以這種僵化的模式來理解台灣文學，只有越來越偏離台灣文學的主要內容。

建立自主性的台灣史觀

面對這種歷史解釋的強勢挑戰，台灣研究的主體建構顯然是一個無法迴避的議題。我們從來不否認台灣歷史和台灣文學與近四百年來的中國有相當程度的聯繫與互動，但這並不意味台灣社會必須永遠隸屬於中國歷史經驗的脈絡裡。歷史經驗的沉澱與累積，是每個特定社會的文化根源。台灣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中國經驗是其中一個環節，而不是唯一的、牢不可破的銜接。

我們永遠無法逃避對台灣歷史的現實(reality)與真實(truth)之認識。就現實面而言，台灣歷史是多軸在發展，亦即由原住民史、移民史、殖民史所構成。在族群結構上與語言文化的成分上，已經不是以單純的中國經驗就能概括。在真實面而言，這塊島上的住民已發展出根深蒂固的歷史意識，在這個歷史意識的基礎上，所有住民之間建立起一種特殊的情感與價值，而這也不是中國經驗能輕易介入的。

因此，台灣史觀的建立並不能專注於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之想像。作為一個台灣史的書寫者，我寧可把焦點集中在台灣社會內部的文化結構。就台灣文學的內容而言，作家所關心的是性別議題、階級議題與族群議題。偏離這種豐富的社會文化內容，就無法明白台灣文學性格的生動活潑。同

理可證，台灣歷史研究也絕對不可能偏離台灣社會經驗而建構恰當的歷史解釋。

當全球化趨勢日益發展成為人類歷史的主導力量時，台灣歷史與台灣文學的研究就更加迫切需要歷史定位。知識經濟的時代降臨之際，台灣社會無法排斥與國際接軌的要求。能夠代表台灣文化成就之一的，不能不推台灣歷史與台灣文學這兩個重要領域。在抗拒中國歷史解釋的收編之餘，我們也同時必須抗拒全球化對於台灣主體的泯滅。在這歷史轉型的關鍵時期，自主性的台灣史觀之建立，就成為台灣研究者的共同課題。